

回望故国心自忧

——试论瞿秋白《饿乡纪程》中的忧患意识

李 丽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对现实人生、社会现状的深邃思考,是历代进步作家对国家兴亡、人民苦难深切关怀的艺术表现。中国文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瞿秋白的忧患意识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更来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往往是忧世之思的大忧患,与其不同,瞿秋白散文集《饿乡纪程》中表现的是个人之忧的小忧患向忧世之思的大忧患的转化。

[关键词] 忧患意识; 俄罗斯文学; 瞿秋白散文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1-0096-03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散文集是瞿秋白在1920至1923年第一次旅俄其间所作的,记录作者思想转变的过程,是“心弦上乐谱的记录”。《饿乡纪程》记叙从北京到莫斯科途中的见闻观感,前半部分近于自传性质,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及生活经历,后半部分记叙出国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在对现实的叙述中,作者时时流露出感时忧国,忧患民生的思想。“《饿乡纪程》更重社会性和思想性,一面是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一面则通过整个社会的面影来思索社会落后、政治黑暗和人民苦难的根源,有时又对人生展开思索。在三个多月的漫长旅程中,作者可充分领略社会的众生相。”^[1]

忧患意识是指对国家、民族或个人出于责任感而产生的对其存在状态或未来发展前途的一种深沉的忧虑。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对忧患心理的形成作了这样的阐述:“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2]由此可见,责任感是忧患意识的出发点,忧患由责任而发。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对现实人生、社会现状的深邃思考,是历代进步作家对国家兴亡、人民苦难深切关怀的艺术表现。正如日本厨川白村所说:“文艺决不是俗众的玩弄物,乃是该严肃而且沉痛的人间苦的象征。”^[3]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忧患意识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文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许多文学作品都表

达了忧患思想,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这种忧患意识的最好写照。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迪了现代作家个性解放的思想,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忧患意识。面对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国家、社会和现实人生,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不免要生出隐隐忧痛,他们苦苦地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

身处忧患意识强烈的大环境中,瞿秋白的创作难免不受这种意识的影响,同时忧患意识与他自身的政治追求和文学理想也是相契合的。他是一位文人,但又是一位政治家,作为有着政治家身份的文人,对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他认为,虽然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但二者是密切相关的,在优秀的文艺作品里,艺术和政治是相统一的,艺术应当为政治服务,“艺术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4]必要的时候,政治可以“侵略文艺”。中国文学传统、现实文学环境的影响,自身政治理想的追求使瞿秋白的文学创作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其作品的忧患意识也就尤其强烈。但在瞿秋白散文中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更多的是来自于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瞿秋白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密切的,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几乎都和俄罗斯文学联系在一起。不论其文艺思想,文学评论还是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摆脱不了俄罗斯文学的印迹。正如有人所说:“俄国和俄罗斯文学引导瞿秋白在寻求光明的道路上奋然前行。”^[5]忧患意识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俄罗斯文学是重人生的,不论在诗歌、戏剧、小说还是散文中,我们都能看到作者对于社会人生的深刻思索。俄罗斯进步作家都以“暴露社会黑暗、提出重大社会问题、展现社会理想为己

[收稿日期] 2007-12-14

[作者简介] 李丽(1979-),女,山东费县人,苏州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任。”^[6]拉季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献词中说:“我举目四顾,人们的苦痛刺痛了我的心”,正是这种“刺痛”让他以忧郁的心情描写了农奴制下农民的悲惨生活,表达了反对农奴制的强烈愿望;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表现了普希金对俄罗斯现实和命运的关注,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因对现实的忧患意识而在灵魂深处产生的痛苦的沉思;在莱蒙托夫的诗歌里,处处可以听到“忧国忧民的高尚灵魂的痛苦呻吟”,^[7]对俄罗斯现实的关切,对于整整一代人命运的思考表现在他的诗作中,如《沉思》、《邻居》、《为什么》等;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表达了对艰难度日的农奴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契诃夫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和对幸福前途的憧憬蕴含于他的中篇小说《草原》中;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高尔基写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俄罗斯文化的悲剧,表现了一代忧国忧民的真诚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8]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接受,同时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瞿秋白的散文带上了深沉严肃的忧患意识。他的散文表现“严肃的、深切的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9]

“文艺作品是本于潜伏在作家的生活内容的深处的人间苦。”^[10]作为一种意识或心理状态,忧患意识又可分为社会忧患意识——从天下、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出发而产生的忧患——忧世之思的大忧患;个人忧患意识——从自我出发,对个人的地位和生活的忧患——忧生之嗟的小忧患。在《饿乡纪程》里,我们首先明显感受到的是他对个人生活境遇的感伤,对家庭亲朋命运多舛的哀叹,体现的是忧生之嗟的个体忧患,即小忧患。入俄之前对自己出身和经历的回顾、整理和反思,沿途所见所闻都使瞿秋白感到深沉的“人间苦”。自己大家庭及亲眷朋友的多舛命运时时触痛着作家的心灵,他担忧每个至亲至爱的命运,流露出无尽的忧思与哀愁。大家庭分崩离析,自己一家人星散各地,使瞿秋白心怀深深的隐痛,母亲的无奈自杀更是给了他巨大的打击。他作《哭母》诗“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让人倍感凄凉与哀痛。亲属们的生活也是举步维艰:一少寡的表姊,同一遗腹子孤苦伶仃地住在母家,生活极其困难,精神苦痛不可言喻;住在天津的二表姊因家庭生活苦痛的折磨消去了青春美的痕迹,虽然生活过得拮据,丈夫却仍不改抽鸦片的劣习;还是个孩子的三妹小时定亲许给人家,现在不得不只身从南方嫁到北方,不懂世事的她还要担起家庭的责任,孤独寂寞思乡思亲之情时刻烦扰着尚还幼小的心灵。寄人篱下的生活让瞿秋白在精神上倍感凄苦无奈,而大家族成员之间貌合神离的关系,表面上“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诅咒毒害”更让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感觉“昏昧极了”。

瞿秋白写到了自己一大家人的命运不济的遭遇,每个人都如一只残破的小舟,在社会的万丈波涛中颠簸回旋,一个大浪打来就可能把这些破船打得粉碎,陷入社会万丈深渊的最底层,永无复苏之日。表面上看,瞿秋白写的都是自己家庭的苦难,是对自己家人命运忧患的表白。然而,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看到的远不是他自己眼前个人的利益,不是家庭个人的成败得失。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蕴涵的巨

大的社会内涵,我们不禁豁然开朗:瞿秋白所抒的实际上就是忧世之思的大忧患。因为“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应的蜃楼”。(《饿乡纪程二》)自己家庭的状况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自己家人的遭遇,也是社会上千千万万的人正在遭受着的。“我的母亲因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这是畸形的社会组织的破产的产物,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士的阶级”如今已处于坍塌崩溃的边缘,于外已没有生存的空间,于内已没有生存的能力。这种畸形的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是导致家庭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破产的真正根源。“我”的父亲只能一个人住在知己朋友家,教书糊口,忧煎病迫,不能承担养育大家庭的责任,然而这不是父亲自己的责任,造成悲剧的还是“这样的社会”——“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饿乡纪程一》)四伯父的拮据来自于中国官场的腐败,旧中国的官僚制度怎么能容得下清廉正直的他,怎么能给他发展的空间?收入不多但仍抽鸦片的表姊丈;定了娃娃亲,不得不远嫁他乡的三表妹;寄住在濒临破产的母家的表姊;所有人的遭遇,都是“旧社会生活的痕迹”,是旧的社会滋生的瘤毒。旧的社会组织,旧的家庭生产制,旧的婚姻制度和旧的家庭道德对人的戕害,通过“我”的家庭的遭遇就可见一斑。

分析到此,我们就可很清晰地看出,瞿秋白写自己家庭的命运不单单是为了说明自己家庭的穷苦离散,哀叹自己命运的不济。他以政治家深邃冷峻的眼光看到了这背后深藏着的整个社会,那个濒临破产,混乱无序的中国社会。他明白:“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饿乡纪程三》),这不是瞿秋白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哀叹自己命运的个人之忧的小忧患,也就转化成担忧整个社会的忧世之思的大忧患。

我们可以看出,瞿秋白强调的不是个人自我的忧患,而是由自我忧患向社会忧患的转换。自然而然,瞿秋白把自己的忧患意识转向了对整个社会的担忧,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了那个现实社会。离开北京,一路北上,瞿秋白近距离接触到中国的社会,北方中国混乱不堪的景象,引发了他对中国社会的隐隐担忧。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在瞿秋白的内心滋生萌发出来。对国家、民族、人民命运和前途的担忧,引发作者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冷峻洞察:现实的中国是“阴沉沉,黑森森,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没见一点半点阳光”。在这样的黑甜乡“只值得昏昏酣睡,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喝罢了”(《饿乡纪程绪言》)。挣扎在“黑甜乡”的人们过的是水深火热的生活,小小的站台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月台上的苦力喘息着,推车的穷人,拖男带女,破笼破箱里总露着褴褛不堪的裙子衣服。北方的中国如同一盘散沙,车站一片嘈杂,污秽杂乱,找个脚夫也不容易;铁路上混乱的管理,破敝败落的车厢,脏、乱、差的客栈。哈尔滨的生活是“沉默静止”的黑色生活,那里识字的人不多,中国学校不过三四处,报馆更不必说了。全哈尔滨书铺竟然买不到一本整本的《庄子》,新书新杂志少到极点。对于像“我”这样的知识阶级来说,生活在了无生气、愚昧、“粗糙”的环境

中,倍感烦闷无聊。国内的社会环境如此,外来的帝国入侵更令人担忧。沿途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压迫的痕迹,中国即将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都让“我”这个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到切骨的痛苦。作者乘火车北上,沿途所见触目惊心,都是日本侵略的痕迹:日本金票,日本警察,日本商铺,日本饭馆,甚至日本人开的妓馆,就连铁道车站上的中国苦力的劳作也要受日本的节制。经济生活也搞得烦乱不堪,沿途不停地要更换钞票,殖民地剥削政策下之经济的弊端显露出来。对此情此景,“我”不禁发出疑问:“仿佛记得中学地理教科书上写着,满洲三省还是中国的领土,……到此却已经另一世界似的,好像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饿乡纪程 六》)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尤其是有着强烈民族自尊感的知识分子,都不会面对国家社会的现状无动于衷,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祖国朝不保夕的状态瞿秋白发出内心的担忧:“中国人所得苟延残喘的一点经济实力未必见保得住啊!”“如若中国不赶紧和远东恢复通商,结一经济同盟,其势决敌不过日本的帝国主义的”。(《饿乡纪程 七》)

忧国忧民的宏大抱负,引发作者批判性的思考。中国政府的无能是造成中国混乱衰败,任人欺压的根本原因。莫大的地力资源自己却不能开发,要等别人来经营。经济也不能计划,导致商务停顿,车站旁“一堆一堆禾麦,盖着积雪,愁惨惨对着凄凉的天色”。(《饿乡纪程 九》)愁惨惨的不只是禾麦,更是辛勤劳作然而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劳动人民,国家的无能让他们陷入绝境。政府的无能不仅使国家的运行陷入瘫痪,人民的生活处于破产,在外交方面也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

瞿秋白将“旧社会一幅一幅的画呈显于吾人之前”,这就是“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对象”。“《饿乡纪程》所着力抨击的,就是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并借此揭示了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旧制度的罪恶。”^[11]深沉而严肃的忧患意识驱使他苦苦追寻中国复兴之路,思索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民族应当如何努力;并欧洲人所笑的野蛮的俄罗斯人都不如”。在“‘非现代的’经济生活里,怎样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殖民地的’剥削政策之下的经济应当怎样整顿呢”?《饿乡纪程 八》)经济建设是基础,但精神方面的建

设尤其是文化建设更是重要保证,瞿秋白意识到了这点,“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饿乡纪程 五》)。所以他不断思索“东方古文化国的文化何时才能重兴”?《饿乡纪程 八》)

瞿秋白《饿乡纪程》中描绘的中国是一片混乱的状态,没有秩序,没有强权,没有幸福,没有欢乐,没有阳光。有的只是崩溃、穷困、无聊、浮躁、黑暗。他的目的不仅在于揭露,更重要的是提出时问题以引起国人“疗救”的注意。中国处在病中,国内到处都是黑暗、病态、呻吟,要改变现状,必须寻求一条光明之路。瞿秋白自己踏上的“饿乡”之旅便是寻求答案的政治探险之旅,为了久处黑暗的弟兄们,“我”愿为大家拨开重障,放光明进来。瞿秋白的散文,为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散文的创作注入一种真诚严肃的品格,将散文表现自我,表达真实的特性推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境界。

[参考文献]

- [1] 王兆胜. 论 20 世纪中国纪游散文[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3).
- [2] 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4.
- [3] [10] 厨川白村. 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M]. 鲁迅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26. 40.
- [4]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3 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67.
- [5] 陈春生. 瞿秋白早期创作与俄罗斯文学[J]. 石河子大学学报, 2002, (1).
- [6] [7] 曹靖华. 俄苏文学史[M].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2. 3. 177.
- [8] 汪介之. 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关照[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75-90.
- [9] 王铁仙. 瞿秋白论稿[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 [11] 朱德发. 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0. 57.

Distressed when Looking Backward to the Native Country

——The sense of concern in Qu Qiubai's proses the way to the country of hungry

LI LI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e sense of concern in literature is the writer's profound reflection to the realistic life and the social present situation; it is enlightened writers'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ir deep concern to the nation's rise and fall and the people's misery of all previous dynasties. The Chinese writers have had intense sense of hardship since ancient times. Qu Qiubai's sense of hardship not only inherited from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radition, but also influenced by the Russian literature, in which the big misery of the whole world often be reflected. Qu Qiubai's proses indica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xpression of minor individual misery to the deep consider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Key words: the sense of concern; Russian literature; Qu Qiubai's proses